

清史耕读

方元 撰

文匯出版社



清史耕读

方元 撰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史耕读 / 方元撰. —上海：文汇出版社，2011.5

ISBN 978-7-5496-0217-9

I . ①清… II . ①方… III. ①中国历史—清代—通俗读物 IV. ①K249.0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92180号

清史耕读

作 者 / 方 元

责任编辑 / 熊 勇

特约编辑 / 杨义侠

装帧设计 / 周 丹

责任校对 / 潘家荣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印刷装订 / 苏州日报印刷中心

版 次 /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787×1092 1/16

印 张 / 18.25

字 数 / 160千

ISBN 978-7-5496-0217-9

定 价 / 32.00元

方元同志是苏州人，我与他同岁，但比他大一岁。我们都是1942年生人。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序

王汝丰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方元同志是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毕业生，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

去年岁末冬初，方元同志寄我厚厚一摞即将付梓的书稿，书名《清史耕读》，讲的都是清朝历史中的人和事。内容丰富，文字通达流畅，涉及有清一代的兴、盛、衰、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方方面面，很有意义。

我和方元同志相识于上世纪“文革”浩劫期间。他当时是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共党史专业的本科学生，风华正茂。我则是中国史专业的一名中年教师，如今已是垂暮之年。1969年，方元毕业分配离校，我随后也因学校停办而调离。一别四十多年，天各一方，蓦然间收到书稿，又是读史、写史之作，着实令我惊喜不已，有老友重逢之感。

方元同志毕业后，起初也从事教育工作，做过中学教师，教书育人。后来听说调任机关工作。这次见到书稿，才知道此后又转岗干部培训，再受命进入传媒界，并成为一位颇有业绩的报人。寄我的书稿，正是他从事报业期间勤奋耕耘的“业余”硕果。这些短小精辟的文字，曾在《姑苏晚报》和《苏州日报》上不定期连续刊出。主要从2002年年底起，到2006年下半年，

大约每隔十天半月，就有一篇与读者见面。后至 2010 年，又添若干。前后八年间，累计百篇之多，每篇千字上下，作者自称“千字文”，是其“副业”。

其实，很多新闻界的前辈先哲，都曾有精深的史学华章见诸报端。他们把自己对历史的研究、读史心得公之于世，作为传承祖国悠久历史文化、倡导学习历史不可或缺的责任。历史学讲求实事求是，新闻学重在客观公正，都必须以真实反映和记录客观存在为其根本，求真求实是两者所共有的本质要素。就此而言，二者相通，方元同志所说的“副业”，也在其“正业”之中。当然，这并非是说新闻工作者都要从事历史的研究。但我感佩媒体人关注历史研究，甚或执笔撰写历史方面的文章，这对读者大众是很有益的。

《姑苏晚报》和《苏州日报》都是富有特色、深受读者喜爱的报纸。

“千字文”虽然只占报纸一角，然而在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环境中，版面如金，两报不惜割此一角，辟出版面刊载谈论历史的专题文章，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实在鲜有其比。于此可见，两家报纸对传播祖国历史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推动学习历史的远见卓识。

清朝是我国历史发展长河中，以满族贵族为主体建立的全国统治政权的历史朝代，是我国数千年历史发展程途中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改革开放以来，清史的研究有巨大的发展，有关清史的话题也受到社会各方面广泛的关注，世纪之交更出现了“清史热”。

人们为何特别注目清史，有许多原因可以解释，可以从不同角度找寻答案。但有一点应是共同的，清代是我国古代专制统治最后一个以皇帝为最高统治权威的历史朝代，它曾经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鼎盛和辉煌，曾经达到传统社会君主专制统治历史的顶峰。同时，它又处于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面临世界历史发展新时代的严峻挑战，在迅猛兴起的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巨潮冲击下懵然而未能自觉。一方面是鼎盛辉煌，一

方面是蹒跚落伍。有清一代康雍乾盛世所隐藏的衰落，及至道咸之间，在西方殖民主义者军舰大炮的轰鸣声中，“天朝上国”从巅峰跌落。从一个独立的国家，一步步沦为西方列强的半殖民地。从顺治皇帝福临起到宣统末代皇帝溥仪止（1644—1911），走过二百六十八年的大清朝的统治大厦倒塌了。这其中的兴、盛、衰、亡，有许多令人自豪、令人悲愤、令人奋起、令人深思的东西太值得人们关注，认真总结。今年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统治一百周年，也是清朝覆亡一百周年，历史的发展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发展。古今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有着无法割断的密切联系和影响。清朝覆亡百年距今并不遥远。以史为鉴，人们可以从中汲取许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这或许就是人们为何特别关注清史的最主要原因。我想，这也应是方元同志之所以在繁忙的报业工作中挤出时间耕读清史的旨趣所归。

方元同志有厚实的史学素养。虽然长期服务于报业，却从未减弱研究历史的热情。《清史耕读》就是这种对历史的炽热情感产生的结晶。作者带着这种“天然情结”，从对“清史热”的关注中学习研究，提出问题，进而努力查阅史料，勤加思考，尽自己的认识去求索答案。每有心得，便以专题短篇的形式提供出来，以求和更多的关注者、读者交流、切磋。作者着眼的是清史中的一个个点，这些点又并非孤立，而是存在于清史的整体之中。诸如雍正是否暴君，晚清洋务运动如何兴起，和珅之贪腐，刘墉之拜相，乾隆之隐忧，嘉庆之守成，袁世凯告密，慈禧训政等等，不一而足。一题一事，一事一论。深浅不一，简短明白。点的连接，即可构成一线，可以从内在的联系中窥见历史的全貌，寻求发展变化的规律。这无疑是很可贵的探索，是《清史耕读》的鲜明特色。作者执著以求、勇于探索的精神也可见于斯。我期盼书稿尽快出版，早日和更多的读者见面，在广泛的交流切磋中使之进一步深化。这将不仅有助于推动对清史的学习了解，

也将对学习历史、认识国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重要意义。

在读到方元同志这部书稿之前，我对连续数年发表的这些文章毫无信息，足见我之孤陋寡闻，不胜愧愧。作者要我为书稿写序，何以敢当，更感惶惶。恳辞不获，只得将读后的感受拉杂写出，忝作卷前感言，权以为序。文不尽意，尚祈作者和读者海涵。

2011年初春于北京怡思苑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原历史系主任、教授，北京市历史学会原副会长、秘书长，中国史学会原副秘书长，现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组专家，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等。）

目 录

序	王汝丰	“最坏暴君”辨	048
		李卫半文盲	051
读史与写史	001	纪晓岚世故	054
满清之“王基”	003	表必出昀手	057
满清之“建制”	006	刘墉的拜相	060
满清之“帝业”	009	江南老名士	063
后金始“汉化”	012	清衰始乾隆	066
“汉化”而“化汉”	015	和珅之跌倒	069
皇太极能文	018	嘉庆帝守成	077
孝庄文皇后	021	蝗虫飞大内	080
多尔袞评析	024	上惟言从脞	083
清初三本书	027	曹振镛“官诀”	086
福临与栋妃	030	不知英吉利	089
统一台湾记	033	奕䜣屡倒霉	092
康熙下江南	036	涤生读经史	097

丁忧练乡勇	100	甲午“前八仙”	180
湘勇始成军	103	甲午“后八仙”	185
太平军起义	106	戊戌年军机	191
两个“六条”折	119	西后掣光绪	194
“同治中兴”辨	124	恭王阻变法	197
滇马案之结	128	“常熟”被罢官	199
日本占琉球	132	小站练兵始	202
崇侍郎丧地	136	袁世凯“告密”	204
曾少卿争土	138	慈禧再“训政”	207
刘铭传治台	141	军阀开山祖	210
对法宣战记	145	义和团斗争	216
淮军之兴衰	149	同盟会革命	225
外交唯妥协	152	黄白红蓝绿	238
洋务开拓者	155	潮过状元出	240
失机“条规”起	158	中堂·大学士	243
修园种祸根	162	内阁·军机处	246
园工沾海军	165	四朝定藏记	249
清漪园改名	168		
耗资两舰队	171	后记	276
“朝比奈”密报	174	参考书目	278
征韩为侵华	176		



历史是人类社会的演进过程，是波澜壮阔、丰富多彩的，而历史书作为这一过程的记述，本应五光十色、引人入胜。

然而，多少年来，我们所见到的历史著作和教材却往往只剩下了干巴的事件堆砌和干瘪的人物排列。我还清楚地记得，在大学的历史专业课上，不少老师的讲授是那样引人入胜，以至听了一课就想听下一课，但也有个别讲授，比较乏味，以至和我同样犯迷糊的学友一拨一拨的，大家反映：“还不如自己到资料室找书看。”

后来，我工作了，没想到，自己也要讲历史。也许有过那样的经历吧，我在备课时，就到处翻找相应的背景资料、人物传记。当然不是涉猎低俗的奇闻轶事。七拼八凑下来，效果竟是意外地好。听者说，原来历史是这么有趣、有味啊。本来么。

现在我的书架子上有不少历史书籍。当然有正史，如《中国通史》。也有资料性的讲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专著，还有评述性的随笔体论著。至于二月河的帝王系列，煞是精彩，但毕竟入的是文学门。

通史权威、可信，读起来却比较枯燥，只有在考证和订据时才看得进去。

也许专业研究人员除外。

资料性的史著可读性强一些，但比较零碎，作结论运用时需要小心。

评述性的随笔体论著，我见之不多，可能孤陋寡闻吧。比较好读、文笔优美的要数易中天先生的《品人录》。他写项羽比《刘邦评传》好看，他写曹操比郭沫若的“翻案”文章更具神采，他写武则天那是电视连续剧无法相比的，他写海瑞要比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有吸引力，而他写雍正，则比二月河的令人信服。

为什么？首推他不孤立地概念地写人，而是把历史人物放到当时五彩纷呈的历史场景中去评述，故而准确、丰满。他还善于比较。比如，他写项羽，实际也写了刘邦，结果两个人物都跃然纸上。尤具特色的是他根据历史事实挖掘了人物的内心世界。我们现在当然无从知道曹操、武则天们那时候是怎么想的，但易先生写了，读来觉得是那么合乎情理，顺乎自然。读来常叫人抚掌称好的还有他那时不时夹带现代语的轻松、幽默、生动的文字。

缺点和不足自是有的。那就是少了历史过程的系统性。这不能苛求易先生，毕竟他是在品人，而不是在写通史。

我突发奇想，如果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取易中天先生和二月河先生之长，把正史修得亲切如许，那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会广为普及。不仅学历史的人爱看，我相信，普通大众也会爱看。台湾同胞们，还有日本青少年也一定会免受那种歪史“教科书”之毒，从而多一份对信史的认同，那岂不功德无量！

（2002年10月18日《姑苏晚报》）

满清之「王基」



皇太极即汗位后，改女真为满洲，改国号为清。清初的“满洲”一词，是满族人对自己民族的自称，也是对整个民族的统称。满族人自称“满洲”，是源于满语系语言。满语系语言，是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的统称。满语系语言，主要分布在今中国东北地区、蒙古、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等地。满语系语言种类繁多，其中以满语、鄂温克语、鄂伦春语、赫哲语等最为重要。满语系语言在历史上曾广泛使用，但随着满族社会的发展，满语逐渐衰落，现在仅在中国东北地区仍有部分使用者。

皇太极即后金汗位的天聪九年（1635）改女真为满洲，“满”来源于女真族的语言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文字——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噶盖在蒙古文字母基础上创制的国书，即满文。天聪十年四月，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清，改元崇德。满清之名始成。至于满清政权坐拥华夏九州，则在多尔袞率八旗入关，福临在北京登基以后。

皇太极首登大清皇位，在其确定满清之名的时刻，多有雄才大略的实际作为。有人说，满清皆水，意在灭朱明之火。这是否是皇太极的初衷？只有天知道。不过，皇太极开拓清王朝那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文治武功倒是无可争辩的佐证。

安民劝农。天命十一年（1626）九月，三十五岁的皇太极即位（被尊天聪汗），第二年改元天聪。皇太极提出的“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成为其执政宗旨。天聪三年二月，鉴于征战事频，掠夺扰民时有发生，下谕三大贝勒、诸贝勒、大臣“毋得科敛民间财物，犯者治罪”。十一月又下令：“凡贝勒大臣有掠归降城堡财物者斩，擅杀降民者抵罪，强

取民物，计所取倍偿之。”二贝勒阿敏屠杀永平官民，分他们的妻子给士卒。皇太极于天聪四年六月大加责怪，并命将永平归众“编为民户”，给予房舍衣食。天聪六年五月，又对诸贝勒大臣重申：“勿杀降，勿分散人妻子，勿夺人衣服财物。”天聪九年三月，皇太极下谕批评牛录章京（三百丁编一牛录；章京，这里指军职，天聪八年牛录、甲喇和固山副佐梅勒之统领官额真，均改称“章京”，近汉语“将军”）筑城苦民致农耕误时指出，以后有滥役妨农者，治其罪。崇德元年（1636）四月皇太极称帝后，下谕：“工筑之兴，有妨农务，前以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有劳民力，良非得已。兹后止葺颓坏，不复兴筑，俾民专勤南亩。”并强调：“满洲、汉人，毋或异视，讼狱差徭，务使均一。”崇德三年七月，下谕大学士希福等：“朕不尚虚文，惟务实政。今国家殷富，政在养民，凡新旧人内穷困无妻孥马匹者，或勇敢可充伍，以贫不能披甲者，许各陈诉，验实给与。”崇德八年六月，皇太极在其生命即将走近终点的日子里，仍念念不忘安民劝农，他给诸王贝勒下谕：“治生者务在节用，治国者重在土地人民。尔等勿专事俘获，以私其亲，其各勤农桑，以敦本计。”

改制集权。努尔哈尔回到盛京的天命六年二月，确定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握；天命七年三月，宣布八和硕（引申为“部落”、“旗”）贝勒“共治国政”，确定继承和更换汗位、审案断罪、议决国事、处理财产等重大问题都由八王（旗主）共同议定。皇太极即汗位初，守制如前，上朝还是他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平起平坐，国务的掌握还是其余三大贝勒“按月分直”。天聪三年正月，皇太极言“向因直月之故，一切机务辄烦诸兄经理”，遂以减轻大家负担为由，下谕诸贝勒代理三大贝勒直月机务。时值草创，征战为上，诸王、贝勒常被分遣领军，实际上弟侄辈也不可能正常处理军国政务。这样，权力很自

然地就集中到皇太极一人手中。这以后，二贝勒阿敏于天聪四年三月弃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并杀降、屠民、收金，获罪幽禁。天聪五年八月大凌河战役中，三贝勒莽古尔泰以所部兵被创，言违误之意，被皇太极指责。莽古尔泰负气地说皇太极独与他为难，还抚佩刀频目皇太极。同母弟德格类贝勒怒斥其悖逆，以拳殴之。莽古尔泰不买账，抽刀出手，左右挥之，众贝勒议其“大不敬”，夺和硕贝勒，降多罗贝勒。十二月，皇太极用礼部参政言，更定元旦朝贺行礼班次。诸贝勒议“莽古尔泰不当与上并坐”。大贝勒代善表态：“自今以后，上南面居中坐，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于侧，诸贝勒坐于我等之下。”在参议众贝勒一致支持下，天聪六年正月起，皇太极开始一人南面独坐，三大贝勒与汗并坐受朝制，终告泡汤；而诸贝勒也打破年齿次序，按旗分班，依次朝见。集权开始形成。

（2004年7月23日《姑苏晚报》）



满清之「建制」

粗定中枢。天聪三年（1629）四月，皇太极建文馆，亦称“书房”，命儒臣分直，职分翻译汉字书籍，记注本朝政事。十年三月改文馆为内三院（国史、秘书、弘文），职事有了扩充。此为顺治十五年（1658）正式设内阁之雏形。虽同在中枢，但文馆大学士、内三院大学士职权之重远不及内阁之殿阁大学士。说句通俗的，前者是掌文史、备咨询的秘书处班子，后者是掌国政、赞诏命的相辅班子。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定官制，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直接听命于大汗，并以诸王贝勒分领管理，从而取代了八旗旗主“共理国政”的旧制，各部下设的承政、参政，分别相当于尚书、侍郎，而启心郎则司监察，入关后改称主事，此外还有掌理满、汉章奏文书的笔帖式（满语“土人”，汉语“博士”）。十二月，参将、文馆同直宁完我又建议六部立言官，辨服制，皇太极嘉纳之。崇德元年（1636）五月，皇太极设都察院，“班六部上”，掌监察；三年六月，又设理藩院，处理与蒙古诸部事及对外关系。至此，有了比较完备的政务构架。

建制后宫。清之后宫体制是皇太极一手创造的。努尔哈赤为汗时，宫闱无位号，老婆循俗称“福晋”。史书记后妃之名，都是子孙们在有了正

式的册封制度后加上去的，“非当时本称也”。1636年皇太极开始当皇帝时，不仅朝廷中枢，就连后宫建置也学了明朝那一套，所谓建五宫，明位号，辨等威。五宫是在原三宫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清宁宫，由原中宫大福晋册封皇后正位入住，顺治帝福临即位，她被尊为皇太后；七年追谥；雍乾朝累加谥孝端文皇后。孝端后，蒙古科尔沁贝勒葬古思之女，名叫哲哲，福临生母庄妃的姑姑，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月嫁皇太极，未生子。关雎宫宸妃，为孝端后侄女，名叫海兰珠，天聪八年（1634）嫁皇太极，甚宠，生一子，二岁殇，册封后入住，称东宫。麟趾宫贵妃，原察哈尔蒙古林丹汗之妻，册封后入住，称西宫，生一子，博穆博果尔。衍庆宫淑妃，亦林丹汗之妻，册封后入住，称次东宫，无子。永福宫庄妃，宸妃之妹，叫布木布泰，即野史传说中并无根据的“大玉儿”，天命十年（1625）二月嫁皇太极，为西宫福晋，册封后入住，称次西宫，生一子，即福临，被尊为“孝庄文皇后”。

重文尚教。天聪三年八月，皇太极下谕：“自古及今，文武并用，以文治世，以武克敌。今欲振兴文教，试录生员。”他要求：“诸贝勒府及满、汉、蒙古所有生员，俱令赴试。”九月，初试生员，拔二百人，赏缎布、免差徭。天聪五年闰十一月，皇太极下谕，总结二贝勒阿敏弃城屠民，是“不学无术所致”，进而规定，凡子弟十五岁以下、八岁以上，“皆令读书”。天聪六年三月，皇太极命文馆达海分析满文音义，谕指：“十二字头无识别。上下字相同。幼学习之，寻常言语，犹易通晓；若人姓名及山川、土地，无文意可寻，必且舛误。尔其审度字旁加圈点，使音义分明，俾读者易晓。”十二字头为达海补额尔德尼、噶盖创制国书所未备。达海承命在字旁加圈点，又以满文与汉字对音，这样有原十二字头为正字，加新补外字，不能尽协者，则以两字相合，国书从此大备。天聪七年十月，皇太极又谕文馆诸臣，行政用兵，一一详载，未合之处，悉心订正，让后

世子孙得以学知。《啸亭杂录》有记：太宗天资敏捷，虽于军旅之际，手不释卷。曾命儒臣翻译三国志及辽、金、元史，性理诸书，以教国人。崇德元年冬十一月，发谕谈读史，“知金世宗真贤君也”，尤其心伟其“申女真人学汉人衣冠之禁”，“宽衣博袖，必废骑射”。恐后世子孙有忘，他又于翔凤楼传谕诸王大臣谨识之。

完善八旗。满洲八旗是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在原牛录组织的基础上创建的军政合一的建制。天聪四年四月，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等自永平前线回来，皇太极在问俘获情况时说：“财帛不足喜，惟多得人为可喜耳。”随着后金领地扩大，满八旗成员也不断补充。同时，皇太极于天聪九年，以所获蒙丁，加上旧蒙二旗，分编增为蒙古八旗；崇德七年六月，在旧汉军一旗基础上增设汉军八旗。蒙汉八旗制与满洲八旗同。至此，清军二十四旗建制完成。

(2004年8月20日《姑苏晚报》)